

学林

◀ (上接 7 版)

云家的曲会,偏好吹笛,能曲甚多,别号“百曲楼主”,是语言学家李方桂(1902—1987)学唱昆曲的启蒙师,其妹徐樱因此而在1932年与李氏结为连理(胡适是主婚人)。徐樱自幼随父兄习昆曲,1937年起,由于李方桂先后在耶鲁、成都燕大、华大与夏威夷大学等地教书,徐樱也随夫在各地之间流转。李方桂与卫德明都是华大远东与俄国研究系的创建人,道邻能进入华大任教,挚友与妹夫都起了作用。道邻(和审义一样)生于日本东京,4岁回国,此后在北京、徐州两地居住,14岁起进入上海英租界读书。树铮非常重视道邻的教育,而道邻也从小便显出其父一样的天赋(据《年谱》,树铮7岁能诗,17岁补廪生),不仅打下了良好的古文与书法功底,而且很早就开始学习英语和德语。1924年底随父出洋,次年1月至柏林读书。除了1925年底回国为父奔丧的几个月之外,他先后在柏林、法兰克福等地学习,1927年6月通过德国中学毕业考试,进入海德堡大学学习法科。1928年转至柏林大学,1929年11月开始准备博士论文,仅用一年多便写作完成。1932年回国,任职于南京国民政府国防设计委员会,此后又历任数职。1938年赴意大利任使馆代办,1941年回国,在重庆国民政府历任国防最高委员会参事等职。战后出任同济大学法学院院长,又先后担任过江苏省与台湾省的政府秘书长。1951年抵台湾,在台大、东海大学任教。1962年赴美,在华大、哥大与密歇根等地任教,1973年因突发心脏病在西雅图家中去世。1930年,徐碧君从柏林来到中国,在南京与徐氏结婚,共育有二女一子,小虎1934年生于柏林,小玉1937年生于南京,幼子徐小瑞(1943—2015)生于重庆。1949年,碧君带着三个孩子从上海赴美,1952年离婚。道邻在台湾再婚,与第二任妻子叶妙暎又生一子一女。

(2)卫(Wilhelm)。据马维立先生称,卫礼贤共有四子,均出生于青岛。长子西格弗里德(Siegfried,1901—1962)是建筑师,1938年之前主要生活在中国;次子曼弗雷德是机械制造工程师,主要在中国工作、生活,直至1956年才离开,他与傅吾康(Wolfgang Franke,1912—2007)是好友;卫德明是第三子;幼子瓦尔特(Walt,1910—1971),1950年代末之前一直在拜耳中国分公司工作,之后进入管理层,常年往返于香港和大陆之间,晚年才回到德国。曼弗雷德只比卫德明年长三岁,两人的关系最亲密:1932年,他从纽伦堡

搬到柏林,与卫德明和徐道邻等住在一起;1939年底,他在鼓楼附近买了一处离傅吾康很近的四合院,卫德明夫妇以及卫礼贤的遗孀都搬了进去。徐审义的妻子王荫松是王荫泰之妹,而曼弗雷德又娶了王荫泰的女儿为妻,从这个意义上而言,徐、卫两家也存在姻亲关系。

(3)库特纳(Kuttner)。斯蒂凡·库特纳生于波恩的一个犹太知识分子家庭,其父格奥尔格(Georg Giora,1877—1916)曾任柏林大学法学教授以及法兰克福大学法学院院长。斯蒂凡从法兰克福搬到柏林的时间仅仅比徐氏晚两个月,而且抵达后立刻住进了徐氏事先为两人找好的双卧室公寓。此后,除了1929年下半年的四个多月之外,他一直是徐氏的室友。1930年4月卫德明搬到柏林后,也跟他们住在一起。1933年纳粹上台后,斯蒂凡流亡至意大利,在梵蒂冈图书馆和宗座拉特朗大学任职。1938年夏天,作为外交人员的徐氏携妻女住进了罗马普拉街(Viale Pola)上的中国使馆官邸,彼处距梵蒂冈城只有5公里远,两位老友应该常有碰面的机会。1940年罗马局势恶化,斯蒂凡又移民至美国,在美国天主教大学、耶鲁和伯克利等地任教。斯蒂凡在美国法学界桃李满天下,被认为是20世纪最重要的教会法学者之一。他与徐氏之间的感情极为深厚,徐小瑞的外文名字George Stephan Hsu就直接来自于他。据徐小虎回忆,1949年6月份,母亲带着他们三姐弟抵达美国后,住在斯蒂凡家里,年轻一代互生情愫,后来两位同窗又因此结为亲家。斯蒂凡的姐姐玛莉安娜(Marianne,1905—?)比徐道邻大一岁,后来成为了一名医生;妹妹蕾娜特(Renate,1915—?)则当了教师。从信文来看,玛莉安娜与徐氏在1929年谈过恋爱。

(4)沃尔夫(Wolff)。康拉德·沃尔夫生于柏林的一个犹太知识分子家庭,其父马丁(Martin,1872—1953)自1903年起便在柏林大学法学院任教,其母玛格丽特(Marguerite,1883—1964)是生于伦敦的犹太裔法学家,曾在柏林一些学术机构任职。为躲避纳粹迫害,康拉德的父母于1934年移居伦敦,之后又在英国从事研究和写作。1925年起,康拉德先后入读海德堡大学和柏林大学;1930年,他在柏林大学获法学博士学位,之后兴趣彻底转向音乐,毕生从事音乐方面的演奏、教学和写作,取得了较大成就。他的钢琴老师包括约瑟夫·罗姆巴(Josef Lomba)与阿图尔·施纳贝尔(Artur Schnabel)前者是李斯特的得意门生,后者则被认为是“发明了贝多芬的人”。纳粹上台

后,康拉德先流亡至巴黎,并在1937年娶德裔前卫摄影师伊尔莎·宾(Ilse Bing)为妻,后又双双移民美国。1998年伊尔莎·宾去世后,夫妻二人的档案、通信、手稿、照片、画稿和音乐作品等遗藏被分成了两部分,分别捐赠给了乔治城大学图书馆(Konrad Wolff – Ilse Bing Collection,编号GTM-160304)和马里兰大学图书馆内的国际钢琴档案库。从信文来看,康拉德的个性非常随和,虽然不与徐氏同屋,却几乎每天形影不离。徐氏为《汉学》提供的稿件及写给卫德明的私人信函,在发出之前都会先拿给康拉德过目,而后者经常用铅笔在打好的信件上作批注,并署名“K”,甚至直接在信末续写一段自己想对卫德明说的内容。康拉德的弟弟维克多(Victor,1911—1944)于1933年在柏林大学法学院获博士学位,1935年流亡至伦敦,成为一名执业律师。二战后期加入英国皇家空军,在战争结束前不久遇难。

(5)伊尔希(Ilch)。伊尔希也是一个富裕的犹太家庭。男主人马克斯(Max,1872—1958)的职业不详,生于慕尼黑,后定居在柏林。女主人生于东普鲁士,随夫改姓前的名字为凯特·乌尔曼(Käthe Ullmann,1885—1967)。纳粹上台后,夫妻二人先是流亡至西班牙,1941年又移民美国。两人的四个孩子都在柏林出生:长女索菲(Sophie或Sophia,1909—1981),后来随夫改姓罗加尔斯基(Ragolski),病逝于耶路撒冷。次女玛莉亚(Maria,1910—2002)1933年嫁给了卫德明,并随其一起前往北京;1947年与卫德明离婚,前往美国投奔父母,最后在加州去世。独子路德维希(Ludwig,1911—1925)不幸早夭。幼女艾娃(Eva Sussane,1914—2007)1933年嫁给了斯蒂凡,两人终身厮守,共养育了9名子女。因此,斯蒂凡与卫德明既是同窗好友,又是连襟。艾娃年纪虽小,但却扮演了“中间人”角色,比如,她极力将自己的中学同学和闺蜜徐碧君介绍给了徐道邻,并促使两人喜结连理。

此外,以王荫泰为代表的王家虽未在信文中直接出现,但与本文讲述的这段历史、这群人物都有密切关联。德文材料中有大量关于王氏夫妇的记载,国内学界却知之甚少,因此也简单作一介绍。王氏出身名门,其父王士通(1863—1931)是民国初年的著名学者和政治人物。他本人曾先后赴日本和德国留学,他进入柏林大学法学院读书的时间比徐、卫等四人早近20年,称得上是一位“老学长”。1911—1913年间,他还在该校的东方语言系(SOS)担任中文讲师。1913年毕



徐道邻与徐碧君 1933 年在南京的婚礼

业回国后,他进入国务院任职,还在北大法科兼任讲师。此后仕途一帆风顺,最高官职为潘复内阁的外交总长和司法总长。抗战期间,他先后加入王克敏和汪精卫的伪政府,日本投降后,他被国民政府以汉奸罪逮捕并判刑,最后病逝于上海提篮桥监狱。1910年代初,他租住在柏林一位神甫的家里,与其女儿路得·凯特纳(Ruth Kettner)相恋,并将其带回了北京。“王太太”(Frau Wang,凯特纳小姐在婚后随夫改姓王)在民国北京的德国人群中非常有影响力,傅吾康的回忆录记载,对旅京德国学者而言,王家的“太太客厅”扮演了与林徽因客厅一样的角色;每周日的下午是王家的沙龙日,也是结识同僚、同事的好机会。著名汉学家谢理士(Ernst Schierlitz,1902—1940)租住在王家,也是通过王太太认识了福华德和傅吾康;季羨林笔下多次出现的德文老师艾锷风(Gustav Ecke,1896—1971)是王太太的表弟,很可能是借由王荫泰的帮助,艾锷风才在1923年获得了在厦门大学任教的机会。王太太也参与了北京德国学校的管理工作,她的6个女儿均在该校接受德式教育,这应当也是王荫泰能与卫礼贤结为亲家的因素之一。徐道邻兄弟的婚姻都与王氏夫妇有关系。徐樱在《俺娘》一文中说,徐审义与王荫松订婚之前,徐家人甚至都没见过新娘子的面,原因就是,徐树铮对留德出身的王荫泰非常欣赏,正如徐州俗语所云“买衣服,看袖子;娶媳妇,看舅子”。徐道邻回国后,打算写信给远在柏林的徐碧君求婚,但又怕

母亲不能接受洋媳妇,十分为难,谁料在他对母亲勇敢表达想法后,却得到热切的支持。原来,王太太经常到徐母面前走动,深得徐母喜欢,认为德国姑娘朴实、勤奋而知礼,比中国的大小姐们还要强些。这些细节都证明了徐、王、卫三家关系的密切。

最后,笔者还想简单谈一下人名翻译的问题。有不少书将卫礼贤的汉姓“卫(衛)”写成“尉”,其实不然。周一良回忆,青岛礼贤书院创办的早期,卫礼贤确实使用过一段时间“尉”字,后来他嫌“尉”字带有军队、战争的色彩,就改成了“卫”。卫礼贤的四个儿子既然长期在中国生活,应该都取过汉名,可惜我们现在知道的只有卫德明,剩下三人的姓名只能音译。徐氏在写信时尤其喜用昵称,一般的做法是给人名加上表示“小”的德语名词后缀“-chen”,如“小康”(Konradchen)、“小德明”(Hellmchen),但他也经常无规则混用名字的缩短版与变体,提高了解读信文的难度。比如,他有时以“小燕”(Jannchen)来指代玛莉安娜(Marianne),变音逻辑为:Jannchen是“燕娜”(Janna或Janne)的爱称,而燕娜又与玛莉安娜的后半部分发音接近。再比如,徐碧君的名字芭芭拉(Barbara)在他笔下一律写作“巴贝尔”(Bärbel),导致“谁先谁后”的问题难以解决;若Bärbel在先,则Barbara是她移居美国后“去德国化”而改的英文名;若Barbara就是她的本名,则Bärbel只是徐氏选用的昵称。姓名是否准确,在检索档案和数据库时关系甚大,因此特作说明。 ■